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强社会与弱国家

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

【美】乔尔·S·米格代尔 著

张长东 朱海雷 隋春波 陈玲 译 张长东 校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强社会与弱国家

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

乔尔·S.米格代尔 著
张长东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PHOENIX LIBRA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美)米格代尔(Migdal, J. S.)著;张长东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6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ISBN 978-7-214-08125-4

I. ①强… II. ①米… ②张… III. ①第三世界—研究 IV. ①D5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2552号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Copyright © 1988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8-067

书 名 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

著 者 乔尔·S.米格代尔

译 者 张长东 朱海雷 隋春波 陈玲

责任编辑 刘焱

装帧设计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1304毫米 1/32

印 张 10.75 插页4

字 数 29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2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8125-4

定 价 31.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译者的话

20世纪80年代,摆脱了行为主义和世界体系论主导的美国比较政治学界兴起了一股研究国家的新的浪潮。以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西达·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等人为代表的许多学者展开了许多把国家作为分析中心的杰出研究,人们将他们的研究称为“国家中心主义”。这些学者着重分析了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等概念并提出了一系列命题假设,有力地推动了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然而,国家中心主义很快受到了各种挑战,它对国家自主性的过分强调、对国家能力的过分乐观,都使得其解释能力受到局限。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来自本书作者米格代尔教授,而本书也正是其代表作。正如本书的标题所展示的那样,国家并不一定是强大的,相对于社会,国家可能是很弱的——看上去是庞然大物的国家,往往无力从社会中提取足够的资源,无法按照自身意志改造社会。

本书是作者反思当时流行的政治学思潮并进行创新的产物。针对之前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理论和依附论,以及当时方兴未艾的国家中心主义,作者都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批评,并提出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国

家”(state in society)的分析路径,强调必须平衡地看待国家和社会在发展中的作用:二者的作用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既要看到国家对社会的影响,也不能忽视社会对国家的影响,二者处于一种相互转化(mutual transformation)的关系之中。他在1994年和科利(Atul Kohli)、许(Shue)共同主编了《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一书,收集了许多研究国家—社会关系的文章,其中多数文章都采用了“在社会中的国家”的分析路径;2001年,他在《社会中的国家》一书中发展并详细阐释了这一分析路径。在本书中,他侧重分析了社会结构对于国家政治的重要性。

本书侧重回答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的能力存在很大的差别,特别是为什么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能力很弱,无法实现许多公认为国家需要实现的目标这一问题。本书对国家能力的概念界定,对国家能力的分类及理清不同类型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对阻碍国家提高国家能力的机制分析,都极具洞察力。其他概念如社会控制、生存政治、政策执行中的相互妥协,等等,都对我们研究发展,包括中国的政治发展,很有借鉴意义。本书面世后,一些学者提出了诸如“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无力的国家”(powerless state)、“无国家的社会”(stateless society)等概念,来描述那些未能有效完成国家建构、提高国家能力的国家。

除了提出分析框架和许多概念之外,本书还比较成功地将宏观社会结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宏大背景)和理性选择的微观基础(microfoundation)结合了起来,并将其放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之中,这在20年前的学术界是比较少见的,是站在方法论的前沿的。^①即使是20年后的今天,能熟练地将二者结合起来的著作还是很少。

^① 在译者和作者的私下交谈中,作者认为他并没有有意识地这么做,而且他认为他本人并不是一个理性选择主义者。但是客观上他却做到了。关于这一点,也可参见 Whiting, Susan H., *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该书的中译本已面世。

当然,每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是不完美的。而且,社会科学的本质是一种片面的真理,往往是矫枉过正的。因为科学需要简约化(par-simony),但是现实确实是丰富多彩的,因此我们只能努力去把握其中的一个侧面。作者关注的问题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能力,而非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和民主化。然而二者却是紧密相关的,一个国家的制度影响其国家能力。或者,用迈克尔·曼的术语来说,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和专制性权力之间相互影响。譬如,在研究非洲国家农业政策时,贝茨(Bates)发现,肯尼亚之所以和其他非洲国家在政策制订、执行和政策绩效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是因为肯尼亚的民主制度(选举)使得政策制订者(政客)为获取选举胜利而制定有利于广大选民而非小的利益集团的政策,而利益集团在其他非洲国家则成功地俘获了政策制订者。^①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上述问题直到今天还是一个非常缺乏研究的问题。

对本书的另外一个主要批评来自彼得·埃文斯。埃文斯认为,米格代尔只看到了国家和社会间冲突的一面(零和博弈),而没能看到二者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促进,形成双赢局面。^②或者,用帕特南的话来说,可以形成“强国家,强社会,强经济”。^③这一方面和两人所分析的问题性质不同有关,米格代尔关注社会控制,而埃文斯关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在1994年米格代尔主编的一本书中,他明确提出,国家、社会之间存在相互增权的可能性。^④

① Robert H. Bates, *Beyond the Miracle of the Marke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Development in Kenya*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② Peter B.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本书的中译本也将面世。

③ Robert D. Putnam, Robert Leonardi, and Raffaella Nanetti,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译者认为,如果我们对社会资本进行详细分析,则会发现米格代尔对社会控制的分析包含了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并对其纵向社会资本进行了比帕特南更为深刻的分析论述。

④ Joel S. Migdal, Atul Kohil, and Vivienne Shue,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无庸讳言,本书的话题和分析框架,在当今的美国学术界已经不再是主流话题了。正如时尚界总是需要定期改变流行时尚一样,学者们也未能免俗。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阿尔蒙德称之为学者们都不去读十年前的著作的年代。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新的著作,都有意无意地受到本书思想的深刻影响。另外,如果我们换个视角,以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看待本书,我们又能从中获得许多关于制度变迁,尤其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间互相影响、互相转化的启发。子曰“温故而知新”,诚哉斯言!

本书作者米格代尔教授早年师从亨廷顿。在哈佛学习期间,还得到艾森斯塔特、希尔斯等大师的言传身教。毕业后,他曾先后任教于特拉维夫大学和哈佛大学,并于1980年受邀任教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并参与组建杰克逊国际关系学院,现任该院的讲座教授并在政治学系兼职。他的第一本书《农民、政治与革命》已于1996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翻译出版。他的另外几本著作,《社会中的国家》和《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也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相信这些著作对我国读者更全面地了解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尤其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会有很大的帮助。

译者

2008年秋于西雅图

致 谢

本书从酝酿到出版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本书的最初想法来自我1974—1975年在特拉维夫大学的一个研究生讨论课。在那个时候，写这样一本雄心勃勃的书看起来是无法抗拒的，但我最终却将之后的几年时间花在了写《巴勒斯坦的社会和政治》(*Palestinian Society and Politics*)一书之上(该书198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一个更小的分析框架之内论述了相似的一些观点。在哈佛大学，我重新开始写作本书，其间亨廷顿担任主任的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支持使我受益匪浅。

1980年我转到了华盛顿大学，花费了大量时间，在亨利·杰克逊国际关系学院建立并领导一个新的、现在已非常成功的国际研究项目。1985—1986年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度过的一年给了我充分的时间来完成本书的手稿。我对希伯来大学的哈里·杜鲁门和平研究所及其所长哈罗德·希夫林(Harold Schiffrin)深表谢意。

从以色列的海法，到加州的斯坦福，到墨西哥城，在无数个教师研讨会上，我也将本书书稿呈上讨论。因为得到参与会议的同行们——人数太多以至于我无法一一致谢——的帮助，本书质量得以

大大提高。本书引起了很多同行的兴趣,他们写了长篇的评论,我得以从中受益。虽然有时我的自负受到打击,但我还是要对他们表达我的谢意: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迈伦·格莱兹(Myron Glaze)、佩尼娜·格莱泽(Penina Glazer)、梅里丽·格林德尔(Merilee Grindle)、芬·汉普森(Fen Hampson)、里萨特·卡萨巴(Resat Kasaba)、巴鲁克·基默林(Baruch Kimmerling)、戴维·莱廷(David Laitin)、彼得·兰格(Peter Lange)、亚瑟·利布曼(Arthur Liebman)、约翰·蒙哥马利(John Montgomery)、埃里克·诺德林格(Eric Nordlinger)、丹尼尔·皮尔逊(Daniel Pearson)、达夫·罗南(Dov Ronen)、霍华德·斯波多克(Howard Spodok)、马克·特斯勒(Mark Tessler),以及我于1985年去世的好友特德·斯坦(Ted Stein)。迈伦·阿罗诺夫(Myron Aronoff)不仅阅读了书稿,还要求他的讨论课上的学生写论文评论此书。

阿伦·克利曼(Aaron Klieman)、艾伦·朱克曼(Alan Zuckerman)和约翰·沃特伯里(John Waterbury)三位同事阅读了整部书稿并给了我长篇评论,对此我心存感激。我还要对克里·伯杰(Kerry Berger)、萨缪尔·卡拉丹(Samuel Carradine)、吉尔·克里斯特尔(Jill Crystal)、玛丽·邓恩(Mary Dunn)、唐娜·埃伯温(Donna Eberwine)、玛丽·菲克塞尔(Mary Fiskel)、迈克尔·弗塔多(Michael Furtado)、安·戈尔茨坦(Ann Goldstein)、玛丽·希尔德布兰德(Mary Hilderbrand)和托德·拉森(Todd Larson)在本书研究过程中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南希·艾奇逊(Nancy Acheson)是一个杰出的打字员(以及编辑)。此书中部分内容的早期版本形成了两篇论文,一篇是《一个国家—社会关系的模型》,收入霍华德·J·威亚尔逊(Howard J. Wiarda)主编的《比较政治学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一书。另一篇则是《强社会与弱国家:权力和妥协》,收入了魏纳(Myron Weiner)和享廷顿主编的《理解政治发

展》(*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一书。

在我开始以一种新方式思考第三世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时候，我的孩子塔马和阿姆拉姆尚未出生，另一个孩子阿里拉还在襁褓之中。我的妻子马西为此付出了很多。她是我生命中的伴侣，经常给我带来新的能量、好奇和理解力。在此，我将本书献给她。

中译版序言

自本书英文版于 20 年前出版起,每当看到其中的许多思想被那么多论述国家及国家—社会关系的著作所引用,我都由衷地高兴。这些著述涉及的地域十分广泛,从南太平洋(Dauvergne, Peter 1998)、日本(Haddad, Mary Alice 2007),到伊朗(Smith, Benjamin 2007)。在这些著述中,我在本书中提出的国家嵌于社会中的思想得到了新一代比较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的共鸣。从韩国,到土耳其,再到英国,年轻一代学者运用并改进了本书提出的分析路径。

《强社会与弱国家》一书的目标之一是提出一个对国家进行比较研究的新模型,这个模型应该不同于基于欧洲历史——至少是许多学者所认为的欧洲历史——得出的国家模型。我很高兴地看到,许多新研究都开始脱离欧洲模型而寻求更为动态的分析模式。美国、欧洲、韩国和其他地区的年轻一代学者们都开始弃用决定论色彩浓厚的分析路径(approach),而转向历史的、过程导向的研究路径^①,以分析(社会发展的)非

^① 和历史的、过程导向的研究方法相对立的是比较的、静态的研究(comparative static),这是近年来被广泛采用的一种分析思路和定性的研究方法。相对于比较、静态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更强调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多个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内生性 (转下页)

决定性和不可预测的结果。

虽然存在着各种问题,但我们还是不能彻底抛弃欧洲模型。不论好坏,欧洲模型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种期望:国家应该做什么,国家应该包含哪些机构(如议会、法院、公立学校等)。这种期望在全球范围产生了作用,使各个国家看起来十分相似。迈耶(John Meyer)等人将此类国家机构(制度)的复制视为“在资源和传统截然不同的环境中的结构性相似”(Meyer, John W. 1997, s145),而我则简单称之为“国家的形象”(image of the state)^①——一个关于国家应该做什么的规范性理解。

国家的形象包含什么内容呢?它包含了两个相悖的基本要素,它们同时很好地描绘了国家作为统治者和乞求者的双重角色。统治者的角色是由韦伯对国家的描述——国家是通过宣称“在一固定领土内合法地垄断武力”而实现“人统治人的关系”——引申而来的(224 Gerth, H. H. 1958)。国家对嘲弄其权威的人——无论是本国国民还是外国国民——施以可怕的威胁。在这一图像下,国家是复杂但一元的——整合的、有凝聚力的、自主的,并且在任何领域都(能有效)发挥作用。就像一台开足了马力的机器,国家拥有广泛的社会控制能力。国家最根本的工具是暴力。

国家的第二个形象,也就是它作为乞求者的形象,却体现了国家更多地是生长于社会之中,而非仅仅是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如其统治者形象所描绘的那样)。在这里,我将以现代社会科学的另一个奠基人迪尔凯姆为例来说明。对迪尔凯姆而言,国家是“所有事物聚集在一起”的中心点。国家联合了“由社会集体在长时间内酝酿产生、并在每个社会成员之中散播的情感、理想和信念”(Durkheim, E. 1986)。在这个意

(接上页)(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并非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互相影响)。一些重要的概念,如路径依赖、时机和顺序(timing and sequence)等被广泛运用于这种研究方法。——译注

① 因为 image 一词意思较多,翻译较为困难。作者选用 image 一词受到 Bendict, *Imagined Community* (中译《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影响,但“想象”一词亦可作为动词,用在这里也不是很适合下文,故此选用“形象”一词。——译注

义上,民族制造了国家;用安东尼·马科斯的话来说,则是“大众间最广泛的忠诚都聚集在一起,服务于国家,由国家提供”(Marx, A. W. 2003)。此处,最根本的工具是忠诚或者合法性。

综上所述,最流行的国家形象由矛盾的、不可调和的两个部分构成:一方面它运用权威去驯服截然不同的信念,另一方面,它却同时从“公意”中提取人们的忠诚。权威涉及获得民众的服从,而忠诚意味着取得民众的支持——通常是指自愿的支持。运用权威和获取忠诚者都向国家提出了类似的挑战:首先,国家该如何治理一个高度异质的社会——由多个经常是公开争斗的宗教、种族、部落、语言、文化、经济和民族群体,或者是由拥有不同偏好、情感和需求的个体构成?其次,国家如何能取得民族所具有的忠诚,而让其民众支付维持国家和保卫国家所需的费用?

如果国家的一元形象有助于社会科学家们比较研究国家如何面对这些普遍的问题的话,那么,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的那样,作为一个分析模型,这种形象同样有其局限性。正如这一形象所一直暗示的那样,国家在其和其所要统治、代表的社会互动的方式上,以及其统治和代表的真实程度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虽然国家的机构——行政首脑、官僚机构、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学校、监狱、军队等——都在表面上惊人地相似,或者至少都符合某些基本的类别,从而使得不同的国家之间极具可比性,但是进一步分析这些机构后,我们却发现,这些机构之间千差万别。按照一个单一标准或者形象比较国家,将使我们注重国家的形式,忽视其实际功能。国家的外壳可能相像,但内在的东西却惊人地不同。

我将表现现实国家的多样性特征命名为“国家的实践”(practice of the state)。这个术语比我20年前写《强社会与弱国家》时所表达的意思更进了一步。我指出,无论是整个国家还是单个的官僚机构,其各个组成部分和不同的国内外的群体或组织结盟,往往是内部分裂的而不是铁板一块。国家的各个碎片(缺乏整合的部分)和其(在国内外的)盟友们

往往同国家的其他部分,乃至整个国家及其盟友之间相互敌对。这些被疯狂地联结起来的联盟和帮派,使得参与其中的国家机构经常违背国家整体逻辑而行事,最终无法履行其职责。而那些团结国家、社会各部分并使得不同联盟间相互对立的纽带,则会摧毁以下观念:国家是一个有公认的目标的统一机构。无数发生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各种各样的例子,都推翻了国家是一个一元化、有特定目的、高度整合且具有内聚力的机构的观念。

在过去的十年中,许多比较政治学的著作都一方面在努力维护“国家”概念——其被神圣化了的形象——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则同时研究国家在现实中惊人的多样性和这些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兴起时所处的截然不同的条件——国家的实践。正如一群欧洲社会科学家们在2006年举办的一个研讨会^①上所提到的那样:“一些醒目的标题,诸如国家的失败(state failure)、弱国家(weak states)或善治(good governance),都显示了人们试图抓住全球范围内日益复杂化的政治权威的实质的各种努力。”这些“醒目的标题”指出了将理想化的西方国家的单一标准或其他单一标准简单应用于比较分析时所面临的局限性,但同时也认可了一个单一现代国家种系的存在——至少是在普通人心目中的存在。

那么,一个视野更开阔的关于国家的比较政治学研究需要超越一个单一的国家形象所包含的局限性。但我认为如果矫枉过正,简单地将把国家作为一个形象的分析工具彻底抛弃,也是错误的。毕竟,它提供了有关国家应当做什么这样一幅图景,不止是被学者,还被全世界普通民众所广为接受,而且还包涵了当代国家在外形上的高度相似性这一现状。但这一规范性的形象必须被放在国家的令人发狂的现实多样性的

^① 丹麦国际关系研究所、洪堡大学(柏林)社会科学研究所和马科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举办的系列研讨会之一。

背景之下。国与国之间在各个方面都可能会截然不同：从执行其领导者宣称的政策的有效性，到它与民众的关系。简而言之，任何关于国家的可行的定义，都需要考虑理想型的一元国家模型的二元性：它的形象，以及它的实践——其日常生活中的多样性。以下关于国家的定义是我在长期思考中逐渐形成的，可以追溯到本书最早出版的时候（1988年）。这个概念试图把握国家的两面性：一方面指出其同质性——形象上的普遍一致性，另一方面指出国家在其行政管理、与民众的关系，以及和其他国家、跨国组织的关系等方面的实践的多样性。

国家是一个权力场，其特征是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而试图控制人们的行为。它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1）一个在一定领土上的有内聚力的支配性组织，这个组织从其所辖领土内生长出来并代表领土内的所有人民；（2）该组织各组成部分的实践。（Migdal 2001）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强社会与弱国家》一书的中文版即将面世。在我努力学习发生在中国的一切并思考其状况时，我开始归纳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推动我从事本书的写作。我希望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将使我能和更多希望了解本国和他国社会的中国年轻一代的学者及学生进行对话。

乔尔·S.米格代尔

2007年11月25日于华盛顿州西雅图

参考文献

Dauvergne, Peter, and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Dep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8. *The rise of an environmental superpower? : evaluating Japanese environmental aid to Southeast Asia*. Acton, A. C. T. :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Dep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